

# 历史时期宁绍平原城市的起源

乐 祖 谋

宁绍平原是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发达最早的地区之一。据史籍记载,早在春秋越国时代,本地区已经出现了事先经过周密规划后建立的城市。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以来,本地区一直地小人稠,城镇经济高度发达。目前平原地区人口已经超过600万<sup>①</sup>,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700人左右,共有大小城镇32座<sup>②</sup>,属于我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列。可以想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本地区城市将更加发达,其数量和规模都将扩大,在未来的岁月里,有可能成为杭州湾两岸上海——杭州——宁波大都市化地带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本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将有助于未来的城市规划工作。

迄今为止的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结果证明,历史时期本地区海陆变迁,民族更替,自然环境和社会面貌曾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对本地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即拟以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为主要线索,对本地区主要城市的起源及其规律试作探索。

---

①根据浙江省民政局《浙江省行政区划资料(1979年)》统计。

②根据《浙江省地图册》(浙江测绘局,1980年)统计。

## 一、第四纪海侵对宁绍平原城市起源的影响

侯仁之教授指出：“历史上最初城市的出现，乃是阶级分化的结果，是第一个阶级社会——也就是奴隶社会发展的标志。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sup>①</sup> 这说明对一个地区城市起源的探索，必须从这一地区原始社会经济和原始聚落的发展状况开始。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证明，人类在宁绍平原的社会活动发轫甚早。1973年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发现，说明早在距今约7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已在宁绍平原定居，并且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不仅是本地区，也是全国考古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这一遗址出土的大量实物说明，当时这里的原始居民已经进入母系社会的全盛阶段，他们已经开始栽培水稻，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兼营渔猎和家畜饲养。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已经能够制造大量榫卯结构的木质工具和干栏式建筑。浙江省博物馆在有关考古报告中写道：“在未发现这些实物之前，对于原始人能拥有如此高超的劳动手段，简直是无法想象的。”<sup>②</sup>

河姆渡文化以其年代的久远、先进的水平和独特的风格震动了考古学界。近十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学者的努力，对于河姆渡

---

①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四期。

②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得出了一些根本性的结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二点：

（一）一些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在将河姆渡文化和同时代的中原原始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之后，得出了上古时代，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原始文化自成一个独立系统的结论，从而否定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中心论”。例如曾骐在《“百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文中指出，由于河姆渡文化的崛起，在古代吴越之地“形成了和黄河中游并驾齐驱的另一文明的摇篮。”<sup>①</sup>

（二）一些民族史学者从河姆渡文化和古代越族文化之间的许多共同特点，论证了河姆渡人就是古代越族人的祖先。例如林华东在《试论河姆渡文化与古越族的关系》一文中，就从共同的宗教（图腾）、生活习性（习水便舟）、农耕方式（耜耕）、建筑特征（干栏式建筑）、装饰花纹（几何图形印纹）、特定的工具（有段石锛及印纹陶器）等方面，全面地论述了河姆渡人和古越族之间的承袭关系。<sup>②</sup>

各方面学者在上述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于研究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起源，其重大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然而当我们联系这两个结论来观察本地城市的起源时，却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宁绍平原的原始经济和原始聚落发达甚早，在全国范围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越族的历史记载又表明，宁绍平原的城市出现甚晚，在全国范围处于落后地位。

宁绍平原的正式历史记载始于春秋于越。据《越绝书》等古

---

①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期。

②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期。

籍记载<sup>①</sup>，于越的部族中心在宁绍平原出现是在越王勾践时代。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登位，“徙治山北”，先在平原南部山麓地带的平阳建都<sup>②</sup>，接着又在平原地带建立了大越城（即今绍兴前身）。这是平原地区出现最早的城市，时间是公元前490年前后。

如前所述，城市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则一个地方的原始文明和原始聚落发达得愈早，其城市就必然出现得愈快，这已是一个为我国和全世界城市历史所证实的一般规律。以我国为例，最早出现城市的黄河流域，也正是原始文明最早发达的地区。和河姆渡文化年代相近，水平相当的仰韶文化（河南浥池）和夏代都城阳城（河南登封）、商代都城殷（河南安阳）、周代都城洛邑（河南洛阳）之间在地望和年代上的相应相

原始文化名称 (最早年代)	古代城市名称 (最早年代)	分布地域	相隔年代
白达里文化 (前5,000年)	孟斐斯城 (前3,000年)	尼罗河三角洲平原	约2,000年
埃尔—欧贝德文化 (前4000年)	巴比伦城 (前3,000年)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约1,000年
仰韶文化 (前4,500年)	阳 城 (前2,100年)	河南平原	约2,400年
河姆渡文化 (前5,000年)	大 越 城 (前490年)	宁绍平原	约4,500年

① 《越绝书》卷八。

② 清毛奇龄：《重修平阳寺大殿募疏序》，载《西河文集》卷十六。

承关系是极为明显的。就世界而言,几个著名的文明摇篮,也都是最早出现城市的地区。例如和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年代相近的埃及白达里文化和孟斐斯(Memphis)城、两河流域的埃尔——欧贝德文化和巴比伦(Babylon)城等等<sup>①</sup>。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无论在中国或世界,和河姆渡文化年代相近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原始文化和同地区最早城市之间在出现时间上的间隔,都在2000年左右,而从河姆渡文化到大越城的出现,中间却隔了4500年之久,晚了整整一倍。这不能不是城市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反常现象。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城市起源时间上的反常现象和本地区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反常现象密切相关。考古发现证明,河姆渡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创造了高度的原始文化,然而出现在古籍记载中的春秋时代的于越部族却仍然是“断发文身”<sup>②</sup>,其文明程度仍处在原始蒙昧状态中,甚至当春秋末年越族的全盛时期,其最杰出的领袖越王勾践也仍然承认越国是“僻陋之邦”,人民是“蛮夷之民”<sup>③</sup>。似乎在河姆渡人以后数千年中,这里的人类社会并无多大发展。

更进一步研究又可以发现,上述两个反常现象又是和第三个反常现象——本地区人类原始聚落在地理分布上的反常发展密切相关的。考古学一般将原始人类文化发展序列归结为“山林文化——山麓文化——河谷文化”三个阶段,这说明从山区走向平原,是人类原始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然而宁绍平原原始人类聚落的发展,却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河姆渡遗址的位置紧贴平

① 吴一廬、周一良:《世界通史》上古分册。

②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

③ 《越绝书》卷七。

原南部山麓地带，按一般规律，河姆渡时代以后，其后裔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向北，即走向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的广大平原地区。但现存的历史资料却说明，河姆渡时代以后本地区人类的迁徙方向似乎甚向南，进入平原南部的山地，并长期驻留，直至春秋时代，于越部族仍生活在山区，“人民山居”<sup>①</sup>，而其中心聚落则建立在会稽山地南部的诸暨附近。

显然，河姆渡人以后，本地区人类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是由于人类从平原退入山区这一发展道路的根本转变造成的。山区各种自然条件均不利于原始农业生产的发展，据《吴越春秋》记载，退入会稽山地的越族先民，曾长期过着“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sup>②</sup>的生活，这显然是一种迁徙农业和狩猎业并重的生产方式，和河姆渡时代定居农业为主，兼营渔猎的生产方式相比，反见倒退了。这一倒退，是地理环境改变所致，而社会发展的停滞、城市的晚出现正是其连锁反应。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自从河姆渡文化以后，人类在宁绍平原的社会活动似乎由于某种原因而突然中断了，因而在平原地区人类聚落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段长达数千年的空白阶段。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上也有明显反映。目前考古学界一致认为，在河姆渡文化和后世古越族文化之间存在着“缺环”。例如林华东在上述《试论河姆渡文化与北越族的关系》一文的结语中指出，迄今为止，“在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上，河姆渡文化同以这一地区为主的印纹陶之间的缺环”，“尚未理出”。这里所说的印纹陶文化，正是目前史学界一致定论的古越所特有的文化。

考古发现上的这一“缺环”，是河姆渡时代以后原始人类聚

---

①②《吴越春秋》卷六。

落在宁绍平原一度消失的可靠证据。必须指出,林华东在上述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缺环”的存在,这自然是正确的,然而他把理出这一缺环的希望寄托在平原地区新的考古发掘上,则多半是要落空的。因为林文既然论证了河姆渡人的后裔是古越族人,那么理出这一缺环的发掘活动便应该到南部山区去进行,因为截至春秋末期,越族人的活动区域一直在那里。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河姆渡人的后裔要从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退向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一般说来,在早期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如果发生这种倒退式的“逆向”发展,其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战争、民族压迫等等来自人类的社会动乱——这种情况在秦汉时代的宁绍平原就发生过,当时汉族统治者曾多次对土著越族实行强制迁徙,从而导致大批越人逃亡山区,成为三国时代著名的“山越”的起源<sup>①</sup>。二是由于自然界的巨大灾变。

就河姆渡人时代的社会条件看,第一种原因发生的可能性甚微,可以排除不论。那么,就剩下第二种可能性了。侯仁之先生说得好,如果历史的考据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有从古代地理的情况中来寻求答案了。”<sup>②</sup>

近年来,由于对中国东部沿海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使人们对包括宁绍平原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海陆变迁已基本查清。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举王靖泰等1980年发表的题为《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文章为例。这篇文章指出,晚更新世以来,中国东部平原

---

①叶国庆、辛士成:《关于山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载《百越民族史论集》。

②侯仁之:《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

区曾发生过三次海侵，其中最后一次，亦即文章中所称的“卷转虫海侵”发生在全新世末。这次海侵“大约从15000年前开始，海面上升速度很快，到12000年前左右就达到现代水深-110米的位置上……到了11000年前上升到-60米位置……随后海侵迅速扩大，淹没近海平原，江南地区海水直拍山麓，在华北海岸达到天津以西。沿海岸线形成高3—4米的贝壳堤或海滨沙堤。C<sup>14</sup>测年为 $6,620 \pm 300$ 、 $5,690 \pm 250$ 、 $5,680 \pm 180$ 、 $5,410 \pm 250$ 年前，这是冰后期海侵的最高海岸线。”文章进而联系世界其他地区150多个测点资料，认为这次海侵在全球范围内至6,000年前普遍达到高峰，中国东部沿海“6,000年前的高海面是肯定的”<sup>①</sup>。

关于这次海侵，虽然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稽，但仍可以从宁绍平原的一些历史地名中得到一些信息。今日宁绍平原南部有两大山脉，会稽山和四明山。其中会稽山是个古越语地名。从《越绝书》卷二和卷八的记载中知道，会稽山古代又叫“会夷”，“吴古故（道）从由拳辟塞，度会夷，奏山阴”、“杭坞者，句践杭也，二百石长、员卒七士人，度之会夷”。清人俞樾认为“会夷”是会稽山的古名：“会夷即会稽之异文也。王充《论衡》力辩春禹巡狩会计之说，而未知古有会夷之名。”按《越绝书》卷三记载：“夷，海也。”说明在古越语中，“夷”就是海。会稽山最初既以海字命名，很可能是因为它曾长期滨海。四明山的古越语名字叫“句余山”<sup>②</sup>，《越绝书》卷八记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四明山的原名既和盐有关，很可能也是因为曾经滨海产盐的缘故——事实上，历史时期四明

①载《地理学报》，1980年第四期。

②《光绪鄞县志》卷四引黄南山《简要志》、王深宁《七观》。又见《中国历史地图册》第四分册。



山前的海岸地带历来是著名盐场分布区。因此从四明山和会稽山的地名渊源中，也反映出“海水直拍山麓”的这次海侵的存在和其范围。

近年来宁绍平原的多次地质测量，更证实了这次海侵的存在及其极限年代和范围。

如果把河姆渡文化的持续年代和这次海侵的极盛年代，把河姆渡遗址的地理位置和这次海侵的最大波及范围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内在联系。根据 C<sup>14</sup>测定，河姆渡四个文化层的持续年代约在距今7000—6000年前，这正是“卷转虫海侵”走向高潮的年代，而海侵达到极限的年代和河姆渡文化消失的年代又是完全吻合的。河姆渡遗址紧靠山麓地带，而这里又正是海水最后到达的地方。

显然，联系全新世末这次大海侵所造成的宁绍平原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于河姆渡人以后本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种疑问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可以想见，当距今约6000年，亦即河姆渡最后一个文化层的时候，海水“直拍山麓”，整个平原都被淹没，化为一片浅海，于是这里的人类活动便不得不中断了。此时河姆渡人的后裔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必然开始大规模的迁徙。而其迁徙方向，从各种历史记载看，是分为两支。其中一支退向南山区，在那里繁殖繁衍，成为春秋于越的主要部分，这一支在《越绝书》中被称为“内越”<sup>②</sup>。而这个“习水便舟”的原始部族的另一支则迎水而进，向沿海群岛地区和海外发展。近年来在舟山群岛曾发现相当于河姆渡第一（最后）文化层的原始社会遗

---

①曾骥：《“百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载《百越民族史论集》。

②《越绝书》卷八。

址<sup>①</sup>，这是海侵到来时，河姆渡人朝海上迁徙的证据。这朝海外发展的一支，在《越绝书》中多次提到，称为“外越”、“东海外越”<sup>②</sup>。

浙江省博物馆在有关考古报告中写道：“经初步调查，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宁绍平原东部地区。这一带均为全新世的海相沉积土。曾对这层海相沉积进行了C<sup>14</sup>测定，表明这里的成陆年代比一般认为全新世以来最大一次海侵时间为早。”<sup>③</sup>该报告注意到了河姆渡文化和海侵事件之间的联系，然而其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该报告把河姆渡文化出现年代定在海侵结束、重新成陆之后，这不但和全球范围一致公认的这次海侵达到高潮的年代以及由海侵到海退之间必然有漫长时间间隔这一地理学的常识相违背，而且也河和河姆渡人以后本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相违背。如果早在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宁绍平原已经成陆，人类已在这里定居并创造了如此先进的文化，则这个地区，进而整个东南地区，甚而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有可能要改写了。

多年来，考古学界一直对河姆渡文化的来龙去脉感到迷惑不解。例如曾骥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发展序列》一文中就问道：“河姆渡文化已有发达的农业，其前身是什么？”<sup>④</sup>这说明河姆渡文化不仅后有“缺环”，而且来路不明。其实，从海侵的观点出发，不仅可以解释其去脉，而且可推测其来龙。因

---

①王和平、陈金生：《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83年第一期。

②《越绝书》卷二、卷八。

③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④曾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特点和发展序列》，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一期。

从地质学眼光看，宁绍平原属于浙闽地盾的组成部分。而浙闽地盾在古生代到新生代第三纪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地势基本保持稳定上升，属于中国大地构造中最稳定的地质单元之一。因此，可以想象，在第四纪末大海侵到来之前，今平原地区（包括近海海底）所在已早有原始人类活动存在，而随着这场 12,000 年—6,000 年前的大海侵的逐渐发展，原始人便逐渐朝山麓地带后退，直至河姆渡文化末期，海水直拍山麓为止。由此可见，河姆渡文化只是海侵前本地区漫长原始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其最后的遗存而已。解放以来在宁绍平原发现的原始社会遗址，如慈城东异乡、宁波八字桥、绍兴漓渚遗址等，其年代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其位置都在山麓地带（见图），这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证据。由此又可以推测，在今平原地区（包括近海海底）地下，很可能有比河姆渡遗址埋藏更深，年代更久的原始文化存在，它们应是河姆渡文化的来龙。

必须指出，迄今为止，对于包括河姆渡文化在内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的地理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仍是非常不够的。如果联系第四纪海侵所造成的地理环境变化，则我们对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各原始民族的社会发展、民族迁徙等等问题，都可以获得新的认识。

以上探讨了第四纪海侵对宁绍平原城市起源时间的影响，以下再进一步探讨一下这场海侵对本区城市名称起源的影响，这也是和城市起源问题有重大关系的一个方面。

历史时期，宁绍平原城市地名渊源曾长期笼罩着神话传说的迷雾。本地区三大历史名城——绍兴、余姚、上虞的城市名称一直被人和我国古代著名的虞舜和夏禹的传说联系在一起。

绍兴（前身为会稽、山阴两县，而这两县都因会稽山得名），“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sup>①</sup>

上虞，“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亦云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乐，故曰上虞。”<sup>②</sup>

余姚，“舜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曰余姚。”<sup>③</sup>

根据这种解释，这三座城市都起源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以前的舜、禹时代，其居民都是古汉族人。这当然是和上述考古发掘、地质勘察、历史记载格格不入的无稽之谈。尽管古人从东汉王充直至清代李慈铭都早已对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表示怀疑，而近年来谭其骧先生和陈桥驿先生更多次从语言学的角度科学地论证了其错误所在<sup>④</sup>，但从最近发表的出版物情况看<sup>⑤</sup>，信奉其说的还是大有人在。这就说明，只是论证其错误还不行，还必须进一步揭示造成其错误的根本原因。

舜禹的故事，已经流传了数千年。在传统的古籍中，都认为这个传说起源于黄河流域，认为禹是舜推举的、把中国北方从一次特大洪水中拯救出来的英雄。而古代南方的民间传说中，也流传着舜和禹的同样的故事，并拥有许多舜和禹的故迹。宁绍平原则是这一传说特别流行、这些故迹特别集中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见于历代地方志中的舜禹故迹，在这里的绍兴、余姚和上虞三

①《越绝书》卷八。

②《水经注》卷四十引晋《太康三年地记》。

③《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

④陈桥驿：《论浙江省的方音地名》，载《浙江学刊》1983年第二期。

⑤例如陆继中：《浙江省市、县地名的由来》，载《理论研究动态》1982年第7期。

县境内，就有十八处之多<sup>①</sup>：

名 称	地 址	内 容
禹 陵	会稽县南	禹下葬处。
虞舜巡狩台	会稽县东南一百里	虞舜巡狩处。
舜 王 庙	会稽县东南五十里	舜曾到此。
握 登 山	山阴县西南四十里	舜母生处。
涂 山	山阴县西北四十五里	禹会万国之处。
历 山	余姚县西北八十里	舜所耕处。
秘 图 山	余姚县北一里	禹藏秘图于此。
指 石 山	上虞县西南四十五里	舜登此石。
握登圣母山	上虞县西南四十里	舜母生处。
象 田 山	上虞县西南四十里	舜死，象为之耕田处。
舜 井	上虞县西南四十里	舜避父母害处。
舜 桥	上虞县龙山麓	舜率百官渡处。
百 官 里	上虞县龙山麓	禹会诸侯百官，曾聚于此。
渔 浦 湖	上虞县东南	舜渔处。
粟 里	上虞县南	舜供饷于此。
姚 邱	上虞县西四十里	舜所葬处。
谷 林	上虞县西四十里	舜所生处。
虹 祥 村	上虞县西南四十五里	舜所生处。

①根据《嘉泰会稽志》、《光绪上虞县志》、《光绪余姚县志》、《越中杂识》等统计。

关于南方的禹舜之迹，历来传统的解释，都认为是禹舜南下巡狩所留，或者所封后代所在，这在上述三县名的传统解释中说得很清楚。显然，这种禹舜南下的观点，代表的是中原地区自以为居文明唯一中心的汉族的思想。现在考古学既已证明江南地区也是古代可和中原地区并列的文明中心，则这种禹舜南下传播先进文化的说法，就完全失去了历史根据。

早在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sup>①</sup>。顾先生在对各种古代历史文献资料作周密的分析和比较之后，指出古代关于舜禹治水和巡狩南方的说法，乃是由不同时代的著作家不断累积的结果，因为这些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在被人们公认时的先后顺序恰好与他们的实际顺序相反：禹早于尧舜，尧舜又早于伏羲、神农。顾先生的结论是：“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以后“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而这个传说之所以会传到北方，是因为自周昭王以后，由于战争等原因，北方与楚接触频繁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只是到了周穆王以后，禹的名字才在可靠的历史文献《诗经》中出现。

和传说不同，顾先生关于禹的见解是建立在严密的历史资料分析基础上的，因而是可以令人信服的。这一点，早在三十年代，我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水利史的先驱冀朝鼎，在其名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就已指出了。

今天再来回顾顾先生的这个观点，钦佩之余，唯一觉得可以补充的，就是顾先生对这个神话传说据以产生的地理原因的分析，尚嫌不足。

---

<sup>①</sup>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禹的传说的起因是洪水，而洪水是一种自然地理现象，因此在对这个传说进行历史资料的检验的同时，还必须作地理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析，才能全面地、科学地揭示起源和起因。

首先看一下古籍中对这场洪水的记述，我们举孟子的说法：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sup>①</sup>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sup>②</sup>

孟子对这场洪水的描述，不会出于凭空想象，应该是依据传说而来，从这番描述看，这场洪水一是规模极大，大到“泛滥于中国”、“泛滥于天下”的地步，二是持续时间很长，从尧而舜而禹，长达三代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但言“洪水横流”，却不言洪水从何而来。而后来的说法，一直把它解释为黄河泛滥所致。然而从现代地理学的眼光看，仅由一条河流泛滥，造成这样大、这样久的洪水是根本不可能的。

顾先生并没有否定洪水的说法，只是把它从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把泛滥的河流由黄河转为钱塘江。其实，在上古原始植被尚未遭受破坏的自然条件下，如果黄河不能酿成这样一场洪水的话，钱塘江就更无可能了。

从现代地理学的眼光看，古代传说中这场洪水，虽然并不

---

①《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载《诸子集成》。

②《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载《诸子集成》。

排斥也有河流泛滥的可能在内，但更大可能还是一场海侵。不仅其规模和时间如此，更重要的是洪水的发生方向很可以作证。孟子说“水逆行”，其实已经提供了线索。因为在古人头脑中，“江汉朝宗于海”，因此水由陆地往海洋流，是顺行，而水从海洋往陆地上流，就是逆行了。而这正是海侵时水的运动方向。

据此，古代传说中的这次洪水和治水，很可能是全新世末“卷转虫海侵”和海退在古代越族人头脑中的一个形象化的、曲折过的反映。不难想见，当古越族的祖先由于海侵发生而被迫退向山区后，对昔日平原生活的印象是不会消失殆尽的，对于平原被大水从海上淹没的印象会通过各种形式世代流传下去，这就是“洪水”的起因。而当许多世代以后，海退的时刻到来了，越族人看到南山脚下又重新出现陆地时，因为不能解释，便只能归之神功，这就是“禹”和“治水”的起因。明代嘉靖《浙江通志》的作者薛应旗在访问会稽父老作历史调查时，他们告诉他：“自禹功告成于会稽，而南山之下始有土田”，这说明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禹的名字是始终和平原的成陆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上述表中所列的那些“舜迹”和“禹迹”，考其位置，绝大部分都在南部山麓地带（见下图），这当然不是地理分布上的巧合，而是因为这里正是海退后最早成陆的地方。而根据上述王靖泰的文章，这次海退开始于距今四千年左右，亦即公元前二十世纪前后，而这正是一般公认的夏禹建立夏王朝的时刻。

总之，从各种因素分析，传说中的洪水都应该是第四纪末的那场海侵。就此而论，这个传说当然只可能起源于宁绍平原而不是中原地区。因此可见，追根溯源，宁绍平原城市地名渊源之所以长期和舜禹传说纠缠附会在一起，是因为这里正是这个传说的发源地，而这个传说之所以在这里起源，又是因为第四纪末大海





侵造成的海陆变迁在这里表现得特别典型。

## 二、平原各区主要城市的起源

由于全新世末海侵的影响,使宁绍平原原始聚落的发展,不得不走上一条由平原退入山区,又从山区返回平原的曲折道路。

### (一) 越族原始聚落在南部山区的发展

关于越族原始聚落在南部山区的发展情况,由于史料缺乏,不可能作详尽、确切的描述,只能从山区的地理条件和越族的社会发展情况出发,作一些粗略的探索。

从平原南部山区的地形看,最利于越族先民聚居的地点有三类:一是山后盆地。宁绍平原的南部自西向东排列着龙门、会稽、四明和天台四组山脉,这些山脉由于受构造控制,全部呈东北——西南走向,平行排列。因此两组山脉之间,往往出现长轴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小盆地。其中较大的有金衢和新嵊盆地,还有诸暨、浦江、东阳、天台等较小的盆地。这些盆地底部大多分布着海拔50米左右的河谷平原,因此是最适宜越族先民聚居的地点。二是河谷。本地区几条主要的南北向河流在其出口附近都有狭长的谷地,其河流阶地也是适宜越族先民聚居之处。此外,在山区较高处还分布着许多第四纪夷平面,也就是俗称的“平台”。这些“平台”主要分布在四明山区,在古籍中也屡见记载,其中小的如柿岭平台:“乃一旷土,宽数十亩者”<sup>①</sup>,大的如汉城山平台:“其山顶平广,可容数千人”<sup>②</sup>;更大的如大兰山平台:“山顶平广,可以走马”<sup>③</sup>。这些平台不仅地势开

①明沈明臣:《四明山游记》,载《光绪鄞县志》卷四。

②《宝庆四明志》卷十四。

③《光绪鄞县志》卷四。

阔,而且还时常伴有溪流,因此也很可能成为越族先民的聚居点。

当然,作为中心聚落的城市的形成,需要一定范围的人口较集中的周围地域,因此上述三类地形中,最有条件产生越族早期城市的,当是盆地地区。

至于越族在南部山区的聚落可能发展出最初城市的年代,只能从零星文献资料中所反映的越族社会发展历史中加以推测。从《史记》等书的记载看,越族认为自己是夏禹的后代<sup>①</sup>。这个传说中的祖先的来历,前文已经论及,毋庸复述。夏禹的名字,是和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联系在一起的,而事实上,由于海侵打断了越族原始社会的正常发展,这个古老部族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要晚得多。春秋于越第一次有可靠的世系纪年,是从越王勾践的父亲越王允常开始的<sup>②</sup>。史籍记载,允常登位,是在周敬王十年,亦即公元前510年<sup>③</sup>。允常以前的于越世系,各种史籍说法不同,但最早的始祖,则都推越王无余。从无余到允常,其间隔了多少年?也有几种不同说法。《史记》认为无余“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sup>④</sup>;《越绝书》认为无余后“千有余岁而至勾践”<sup>⑤</sup>;而《吴越春秋》的说法最复杂:“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后隔了“十有余岁”出了一个无壬,自称是无余的“苗末”。无壬后为无睥,“无睥卒,或为夫谭,夫谭生允常”<sup>⑥</sup>。

①《史记》卷四十一《勾践世家》。

②《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1974年。

③《春秋》昭公三十二年。

④《史记》卷四十一《勾践世家》。

⑤《越绝书》卷八。

⑥《吴越春秋》卷六。

这三种说法中,《越绝书》所记年代最久,现姑以之为准,则无余比允常早约一千年,其时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正当商朝初年。无余时代越族的社会制度怎样?杨宽在《战国史》中认为已是奴隶社会了<sup>①</sup>。然而从《吴越春秋》所记载的无余时代的情况看,似乎仍在原始社会阶段。例如《吴越春秋》记载当时越族的生产方式是“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sup>②</sup>,其水平仍在迁徙农业和狩猎并重的原始经济的低下状况;“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sup>③</sup>,则其产品看来也并无多余的可供剥削。特别是《吴越春秋》描写无余的生活是“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sup>④</sup>,完全是一幅平等的原始公社的社会景象,和严酷的、等级森严的奴隶制度实在相去甚远。直到无余以后十余代,“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首领不称职,就下台当百姓,则似乎仍在原始制度之中。这位“末君”之后,越族的世系中断了一段时间,这似乎意味着社会制度有了较大变动。等无壬上台,“自后稍有君臣之义”<sup>⑤</sup>——这正是阶级分化的反映。接着到了允常的时代,吴越战争大见于史载。

《嘉泰会稽志》卷十八引《旧经》记载:“允常拓土,始大称王”,说明越族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这当然不是原始社会的景象了。

范文澜认为《吴越春秋》关于越国世系的记载是可信的<sup>⑥</sup>。据此,则越族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不过在越王勾践之前四代而已。如以二十五年为一代,则其时间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正

---

①杨宽:《战国史》第四章。

②③《吴越春秋》卷六。

④⑤《吴越春秋》卷六。

⑥范文澜:《中国通史》。

当春秋中晚期。由此推论，越族在南部山区的原始聚落有可能发展成早期城市的最早时刻，离其重返宁绍平原，不过一百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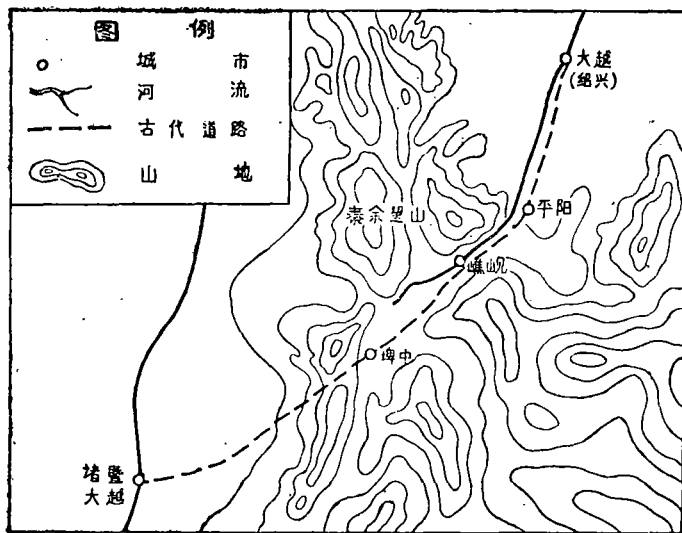
南部山区的越族聚落中最先形成城市的，当然是其部族的中心聚落，亦即后世越国的首都。关于这一时期越族的中心聚落，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越绝书》卷八所说的“诸暨大越”，其位置当在诸暨盆地。此后《水经注》又记载了在会稽山脉的秦余望山南有“嵯岈大城”<sup>①</sup>，也是越族的中心聚落。据《嘉泰会稽志》卷九记载，秦余望山位于今绍兴城正南，是会稽山脉中贴近北部平原的一座山峰，因此“嵯岈大城”很可能位于平原附近的若耶溪谷地中。《水经注》记载“嵯岈大城”是无余建立的，但从这聚落称“城”，又位于贴近平原的地方看，它应该是后期越族重返宁绍平原、对外扩张时迁徙途中建立的。《越绝书》卷八记载越王允常的墓在今绍兴城南十五里的木客，这已经在平原地带了。而据《越绝书》记载，历代越王的墓都是生前建造的，其位置都在中心聚落附近。如《越绝书》记载，勾践生前就在离都城（今绍兴）九里的独山建造自己的墓，后因迁都琅琊，这座墓就中途放弃了。<sup>②</sup>由此推论，越王允常时的中心聚落很可能就是那座贴近平原的嵯岈大城，此后勾践迁都于平原地区，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越族进入阶级社会既然仅在勾践前四代，则这座嵯岈大城似应是越族在南部山区形成的最早的城市。和《水经注》同时代的孔令符在《会稽记》中也记载，在诸暨东北一百零七里，有越国中叶的都城遗址，当时其“离宫别馆，遗基尚在”。从方位和时代看，《会稽记》所说的这座城市，很可能就是嵯岈大城。此

---

①《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注》。

②《越绝书》卷八。

外,《水经注》还记载了另一处越族中心聚落埤中,其位置在“诸暨北界”<sup>①</sup>,这很可能也是越族从诸暨大越出发,向北部平原迁徙途中建立的中心聚落,其地点在诸暨大越和嵯岈大城之间(见下图)。



越族中心聚落迁徙示意图

从越族的社会发展情况看,嵯岈大城很可能是越族在南部山区时期建立的唯一城市。此外,《国语》在记载越国四境时提到的姑蔑、句无和鄞<sup>②</sup>,也应当是越族在南部山区建立的大型聚落。从地图上看,他们大多座落在山后盆地中。其中姑蔑在金衢盆地西南端,今衢州市附近。句无一般认为在诸暨盆地<sup>③</sup>,但如前所

①《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注》。

②《国语·越语》。

③《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注》。

述，诸暨盆地历来是越族中心聚落所在，而《国语》又把句无列为越国南境，一族的中心聚落当然不大会在其边境上，因此句无的位置似应在诸暨以南。考越族地名中又有“姑婺”一地<sup>①</sup>，“姑”、“句”均为古越语发声词，“无”、“婺”音同，因此句无很可能即是姑婺，则其位置当在金衢盆地中部，今金华市附近。又《汉书·地理志》记载，秦汉曾在南部山区第二大盆地新嵊盆地中设有剡县。这也是个古越语地名，因此剡也很可能是越族在南部山区时代建立的大型聚落。

## （二）平原各区城市的起源

当越族在南部山区繁衍发展，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并建立起最初城市的漫长岁月里，宁绍平原的成陆过程也在不断进行着。公元前496年，越族雄才大略的领袖勾践登位，立即决定“徙治山北”<sup>②</sup>，这是海退以后，越族重返宁绍平原的标志。

当然，人类活动在宁绍平原重新出现，其时刻必然在勾践这一决定之前。因为如果当时当地毫无社会基础的话，这一迁都行动是很难想象的。从海退后平原初成时湖沼密布、咸潮出没、土地盐碱化严重的特定地理条件看，最先回到宁绍平原的很可能不是已经长期生活在山区内地的“内越”，而是前文提及的、海侵到来时越族祖先中向海外迁徙的一支——“外越”。前文已经提到，近年在舟山群岛曾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原始村落遗址，这说明当“内越”在南部山区定居的同时，“外越”的社会组织也开始在沿海岛屿上发展起来。春秋越国历史上有名的甬东或称甬句东，很可能就是外越在舟山群岛建立的大型聚落。

---

①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龙邱县”。

② 《越绝书》卷八。

《越绝书》记载：“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别封削焉。”<sup>①</sup>这清楚地表明，在勾践徙治以前，山北的平原地区主要是外越的活动范围，而勾践之所以要徙治山北，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打破内外越地域分布上的界限，从而把整个越部族统一起来。《越绝书》又记载：“富阳里者，外越赐义也，处里门，美以练塘田”。“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sup>②</sup>。这又说明直到勾践在平原地区定都以后，仍在以都城内外最好的田产作为拉拢、安抚外越的手段。

由于山居和海居的生活环境绝然不同，因此外越和内越在生活习性上必然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必然造成他们在返回宁绍平原时的最初聚落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同，这对平原地区城市的起源，有重大影响。例如外越既长期岛居海上，故其主要经济部门应是渔业和与之相关的盐业（历史时期宁绍平原东部居民素有制作并嗜食腌制海产品的风俗习惯，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这一地区的六十大贡品中，腌制海产品就占了五项<sup>③</sup>，这很可能就是外越的遗风）。因此历史时期起源于海岸地带，以盐业为其主要功能的几座城市，很可能就是由外越的盐场聚落发展起来的，而另一些起源于平原南部山麓地带的城市，则应是由内越的农业聚落发展起来的。

按照水系和山地的分布，宁绍平原可以进一步划分成四个小区：1. 肖绍平原；2. 姚江平原；3. 宁奉平原；4. 慈北平原（见下图）。这四个地区所处位置不同，地形条件也有差异，其成陆年代和经济开发也各有先后，故其主要城市的起源和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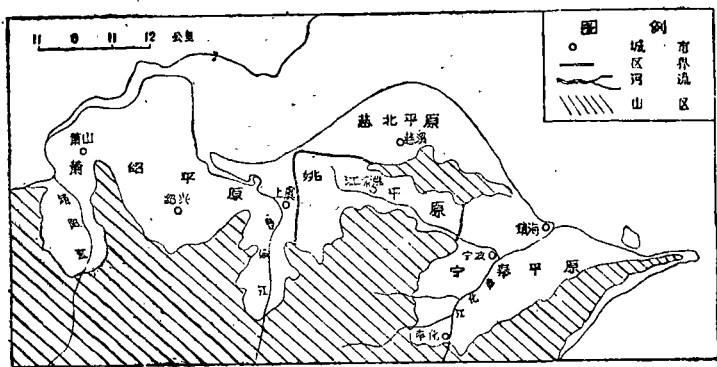
---

①②《越绝书》卷八。

③《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



展，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兹以肖绍平原的绍兴、肖山二城为例，略述其起源和发展概况，因限于篇幅，宁绍平原上的其余六城从略。



宁绍平原分区示意图

肖绍平原是宁绍平原城市起源最早的地方。导致肖绍平原城市早出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里成陆最早。如前所述，宁绍平原是海侵后重新成陆的冲积平原，海侵和海退的开始，由于受全球冰期——间冰期气候因素控制，对整个宁绍平原应是一致的。但由于平原各区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不同，它们在成陆过程中承受的陆源物质有多少之分，因而其成陆时间也必然有先后不同。宁绍平原成陆过程的陆源物质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钱塘江泥沙自西向东而来；二是发源于南部山区的浦阳、曹娥、奉化等河流的泥沙自南向北而来。肖绍平原位于钱塘江口，是承受东西向泥沙最多的地方；同时肖绍平原又是南北向河流最密集的地区，浦阳、曹娥、若耶等河流都在这里出海，因此这里又是承受南北向泥沙最多的地方，则其成陆年代最早，是势所必然的。

历史时期，肖绍平原共有三座城市：绍兴、肖山和上虞。分别

探索绍兴和肖山二城的起源如下。

### 1. 绍兴

绍兴是宁绍平原历史最悠久的城市。这座城市现在的名称得之南宋初年，其前身是秦代设置的山阴县，而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sup>①</sup>，因此这座城市的最初名称应是大越。

大越是春秋越国的首都，因此作为越族的中心聚落，这座城市最初应起源于南部山区，前文提到的诸暨大越，应是其前身。关于绍兴城市的起源和发展，陈桥驿先生已有十分详尽的研究。从陈先生的有关著作中可以知道，绍兴城的迁徙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山区——山麓冲积扇地带——平原孤丘地带。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登位，“徙治山北”，这是越国首都从南部山区迁向平原的始发年代。但根据陈先生的研究，勾践并没有把都城直接迁到今城址所在的平原地带，而是首先定都于山麓地带的平阳，然后才最终迁到今城址<sup>②</sup>。绍兴城在今城址起源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490年。

由于绍兴城是宁绍平原少数几个事先经过周密规划后建立的城市之一，其历史又最悠久，因此研究绍兴城址的选择，对研究宁绍平原其他城市的城址起源，有重大指导意义。

《吴越春秋》卷八记载越大夫范蠡在和越王勾践讨论兴国之策时说的一番话，可看作当时越王君臣在选择都城城址时的标准：“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四

①《越绝书》卷八。

②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载《地理学报》1980年第1期。

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这里范蠡实际提出了理想城址的两个重要条件：（1）地形条件——必须位于平坦的地方；（2）交通条件——必须位于四方交通的枢纽上。范蠡所说的，其实就是现代城市地理学所谓的城市区位（Urban Location）问题，他所拟的这个条件，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最早的区位理论，至今仍是适用的。

然而从现代地理条件看，绍兴城址似乎并不符合范蠡所提出的这两个标准。首先，从城址的地形看，这里正是宁绍平原孤丘分布最密集的地点之一——据古人记载，当时绍兴城区范围内的孤丘有九座之多<sup>①</sup>，并不符合“平易之都”的标准；其次，绍兴城也并不位于现代宁绍平原四方交通的枢纽点上，并非“四达之地”。

显然，如果仅从现代的标准来观察，绍兴城址的选择就很难解释了。

其实，范蠡在这里所说的“平易之都”，是相对越国旧都所在的会稽山地而言。和崎岖的会稽山地相比，则这里确实可谓“平易”了。而越王君臣之所以要选择这个孤丘密集的地点筑城，又是和当时宁绍平原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的。

从地形上看，宁绍平原是一片典型的“孤丘平原”。前文已论及，由于受构造控制，平原南部的四组山脉全部呈西南——东北走向，而宁绍平原东西宽展，其长轴正好和这些山脉的走向直交，因此这些山脉的残尾向外延伸，便构成了数以百计、遍布整个平原地区的孤立山丘。这些孤丘大都由灰岩和凝灰岩构成，高度一般在50米至200米左右。可以想见，当“卷转虫海侵”全盛

---

<sup>①</sup>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卷上。

时，平原沦为浅海，这些孤丘就成为群立于海上的小岛；而当海退开始后，它们又成为滞阻泥沙的一个个“支点”，成为最早成陆的地方。随着泥沙不断沉积，在这些“支点”周围的陆地面积日益扩大，并相互衔接，最终构成广大连片的平原。

此外，正如陈桥驿先生指出，当平原初成之时，大部分地区“江湖密布，咸潮出没”，人们要在此定居、生产，“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sup>①</sup>。于是，崛起于平原上的这些孤丘，就必然成为越族人重返宁绍平时理想的“立足点”。“孤丘上的森林和泉水，提供了燃料和饮水的方便。孤丘南麓的向阳地带，又为人们的居住提供了有利的小气候条件。”

由此可见，无论从宁绍平原的成陆过程，或者平原初成时的自然环境，孤丘聚落都是当时平原地带最先发达，也是唯一可行的聚落形式，即使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如勾践、范蠡之辈，也不能凭主观想象去建造“平易之都”，而只能在当时地理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在原有聚落形式的基础上去“立国树都”。

至于绍兴城址为什么要选择孤丘如此密集的地点，这显然是当时城市的功能决定的。作为一国的首都，全族的中心聚落，其人口必然远远超出那些自然形成的孤丘聚落，“立足点”稀少，当然支持不住人口的压力。

就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特定的地理环境而论，绍兴城址的地形条件是普遍适用的。从下文论述中可以看到，历史时期平原地区所有主要城市，不管其规模有大有小，起源有早有晚，但寻根溯源，其城址都起源于孤丘地带，它们都是在孤丘聚落的基础上兴起的。

---

①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在观察绍兴城址的交通条件时，也必须顾及古今交通路线的变迁。从现代交通路线的分布看，绍兴城址位置很普通，它只居宁绍平原东西交通干线上的一点，和平原上肖甬铁路沿线的许多大小城镇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当我们复原古代绍兴城周围地区的地理面貌及与之相关的交通路线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前文已经论及，越国是从山后盆地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当越国的统治中心迁入宁绍平原之初，这些山后盆地仍是其最重要的后方基地。必须指出，迄今人们对吴越战争史中的地理因素所起的作用一直注意不够，对于越国之所以最后战胜吴国，一般都习惯于归结为两国君主在个人品质和智力上的优劣，而没有注意到越国比吴国有更优越的地理条件。除了因两国地理位置不同造成的受敌面数量多寡上的优势外，越国最重要的地理优势就在于拥有大量安全可靠的山后盆地作为后方基地。这和后来秦战胜东方六国的形势颇为相似，只是规模微小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往山后盆地的路线乃是越国的生命线，而古代从越国最重要的后方基地诸暨、义乌、东阳、浦江、金衢等分布在今浙赣铁路沿线附近的一连串盆地北出宁绍平原的道路和现代完全不同。

前文已论及，上述这些盆地正好夹在宁绍平原西南部两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即会稽山（仙霞岭）和龙门山（千里岗山）之间，于是两山之间的浦阳江河谷，就成为这一连串盆地北出宁绍平原的天然孔道，现代浙赣铁路和杭衢公路就是走的这条道路。因此，浦阳江谷地是现代这些盆地和宁绍平原之间的交通干道。

然而在古代，浦阳江下游是一片湖泊密布的沼泽地，特别是在浦阳江谷地北出宁绍平原的出口处横亘着面积巨大的临浦湖和

渔浦湖<sup>①</sup>，这两个湖泊彼此相连，往北直通钱塘江，从地形上看，在宁绍平原初成之际，这两个湖泊的原始湖盆所在，实际是钱塘江口南侧的一个大海湾。因此当时浦阳江谷地和宁绍平原之间，由于受“临浦湾”的阻隔，彼此并不相通（见294页图）。

当时，从这些盆地通往宁绍平原的交通干道，是从诸暨盆地的东北角出发，越过会稽山脉间的低岭，再顺着若耶溪谷地，从西南方向进入肖绍平原，再折往北，和宁绍平原的东西大道相会。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记载，古代自诸暨东方的枫桥镇“而东北三十里，出古博岭，达郡城，为往来之要道”，又“古博岭，府西南四十五里，群峰交峙，中通一径，俗呼虎博岭……皆南走诸暨之道”<sup>②</sup>；又《越中杂识》：“（绍兴城）西南曰水偏门，曰常禧，俗称早偏门，通诸暨路。”<sup>③</sup>这很可能就是春秋时代从诸暨等盆地北出宁绍平原的交通干道（见294页图）。

从《史记》的有关记载中知道，这条道路直到汉代，仍是从宁绍平原进入诸暨盆地，进而沿古代浙赣大道进入闽、粤的重要通道。《史记·东越列传》记载，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在今福建）王余善反叛，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sup>④</sup>这里第四路大军走的若邪道，据《史记正义》<sup>⑤</sup>，正是上述古代从诸暨通往绍兴的南北干道；而武帝之所以挑选“越侯”为这路军队的统帅，当是因

①陈桥驿：《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载《历史地理》创刊号。

②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二。

③《越中杂识》卷上。

④《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⑤《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正义。

为这条道路乃是越族人所开辟而且久已谙熟的。

关于古代浙赣铁路沿线盆地北出宁绍平原必须走“若邪道”，还可以从《越绝书》记载的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会稽时所走的路线加以验证（见图）。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原本打算在今杭州市附近渡过钱塘江，然后走宁绍平原东西大道到达绍兴，这是最近便的路线。结果却由于“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sup>①</sup>。这个“西百二十里”的渡江地点，至今不能确定，但从方位里程推测，当在今富阳附近。秦始皇从这里渡江后，本当顺着钱塘江南岸仍旧折回东向，沿江东下，然后穿过浦阳江下游进入宁绍平原——这仍不失为一条近路。然而根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渡江后并没有走这条近路，而是继续南下，越过龙门山脉进入诸暨盆地，然后再从诸暨北出会稽山，到达绍兴：“道度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sup>②</sup>。秦始皇在富阳附近渡江之后之所以不走近路，显然因为当时浦阳江下游仍为“临浦湾”时代，挡住了他的去路。而他之所以绕道诸暨，正说明舍去杭州这个渡口后，由诸暨盆地顺“若邪道”北出，是通往绍兴的唯一通道了。

搞清楚了古代联系宁绍平原和山后盆地的这条越国“生命线”的存在，对当时绍兴城址的区位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它正好位于对越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南北交通线和东西交通线的交点上——当时它确如范蠡所说，是“据四达之地”的。

侯仁之先生曾指出：“有些古代城市的城址，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从它开始发展的时候起，一直保留到今天，研究起来并不困难。但有的城市，并不如此。它早期发展的地理条件，在历

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②《越绝书》卷八。

史的进程中已日趋泯灭,以致这个城市最初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原因,今天竟然成了难予解释的谜。”<sup>①</sup>侯先生的这段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对绍兴城址起源的研究,也是适用的。

## 2. 肖山

据史籍记载,肖山县的前身是秦汉时代的余暨县。余暨是个越语地名,因此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应上溯到越族时代。

和绍兴不同,肖山城址的地理特征从古至今一直极为明显。这座城市位于宁绍平原西端,正当平原对外交通的咽喉。在春秋时代,这里是吴越两国间最重要的渡口,因此越国曾在附近建置了著名的军事堡垒固陵<sup>②</sup>,设重兵据守。此后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现代,这座城市是铁路和公路枢纽。因此肖山自古至今都是“四达之地”。

此外,从地图上看,肖山城址的地形特征也很明显。和绍兴一样,这里也是宁绍平原孤丘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在今肖山城西部,从东向西,平行排列着三组丘陵,第一组包括肖山、石岩山等;第二组包括城山、美女山等;第三组包括冠山、回龙山等。《读史方輿纪要》记载,肖山位于“县治西一里,唐以此山名县。”<sup>③</sup>这条资料不仅解释了这座城市现在名称的来历,也说明了城和山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按这里所说“县治”指的是清代亦即现代的肖山城,而根据清人王先谦和洪亮吉的考证<sup>④</sup>,秦汉余暨县的位置,还在现县城的西面,则这座城市最初起源于

---

①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载《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

②《越绝书》卷八。

③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二。

④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王先谦:《后汉书集解·郡国志》卷四。



以山为立足点的孤丘聚落，可以确证无疑。

当然，说肖山城址的地理特征古今不变，主要是指其交通位置和地形条件而言，并不意味着肖山城周围的各种地理条件古今都毫无所变。前面已提及，肖山的前身是余暨，余暨是个越语地名，而据前引《越绝书》记载，“余”的越语本义是盐——《越绝书》的这一记载已为现代古越语学者韦庆稳同志证实无误<sup>①</sup>。然而现代肖山城离海岸有几十里远，而且现代肖山附近海岸并不产盐。因此，如果仅从现代的地理条件出发，这个“余”字就无法理解了。显然，要对“余暨”这个地名作正确的溯源解释，仍然必须先复原古代这座城市周围的地理状况。

这主要指钱塘江河口的古今位置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河口区水化学变化。肖山位于钱塘江口南侧，而对钱塘江出海口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证明，历史时期这条江河的河口摆动在北、中、南三大门之间；目前它走的是北大门，然而这仅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事情；在十七世纪末以前，钱塘江主要走南大门入海，其河口位置在今河口以南<sup>②</sup>。《水经注》卷四十记载，“（浙江）又迳永兴县北，县在会稽东北二十里，故余暨县也……县滨浙江。”永兴是三国吴至唐代肖山城的名称，这说明在南北朝时，岸线仍至薄肖山城下（见下图）。

同时，由于当时海潮从南大门出入，其水道远较现在顺直，潮势相应增强，使河口区的盐度远比现在为高。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直至十一世纪的南宋，钱塘江河口盐场一直延伸到今杭州市西南郊的徐村、梵村一带，而且盐度尚有六分之多。又据《民国肖山县志稿》记载，肖山的西兴盐场，直到十八世纪初方

① 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载《百越民族史论集》。

②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篇》“历史时期海岸线的变迁”。



古代绍兴附近地形及道路示意图

始撤销，这正是钱塘江改出北大门后不久。该志明确指出，这是由于海潮走北大门后，海水变淡的缘故<sup>①</sup>。

搞清楚了肖山城址和钱塘江口关系的古今变化，对于“余

<sup>①</sup>《民国萧山县志稿》卷九。

暨”这个城市最初名称的来历，就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一带在古代正是盐场密布之区。而从余暨这个地名渊源，也可以推测这座城市的起源。如前所述，肖山南部的浦阳江下游地区原先很可能是个海湾，因此这座城市和绍兴不同，它似乎并不起源于南部山区——我们至今仍找不出它有类似绍兴那样从山区——山麓——平原的迁徙过程。这座城市从其原始功能看，应直接起源于海岸地带，它是从原始盐场聚落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其最初居民，很可能是外越。

### 三、结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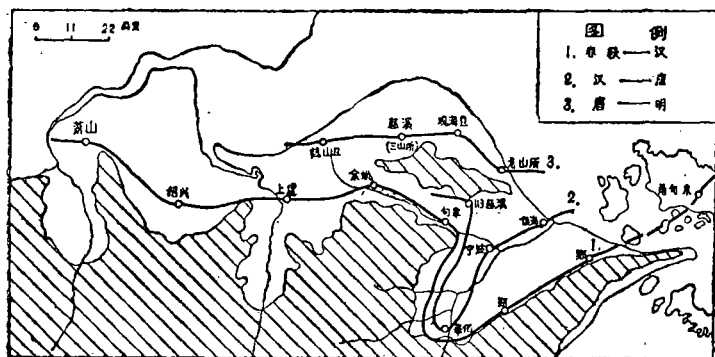
以上是以绍兴，肖山二城为例，对历史时期宁绍平原城市起源的一个粗浅的探索，从中可以归结出以下要点：

（一）第四纪海侵对宁绍平原城市的起源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海侵打断了原始聚落的正常发展，致使本地区城市的出现时间大为推迟。海侵又迫使本地区人类聚落的发展不得不走上由平原退入山区，又从山区返回平原的曲折道路，从而规定了城市迁徙的总方向。海侵还间接地影响了本地区城市的地名渊源解释。

（二）从这些市县城市的起源，可以看到本地区城市的出现年代顺序，是和平原各区的成陆过程相一致。如果把历史时期出现年代相近的城市在地图上用线条连接起来的话，则又可以看到，本地区城市出现的空间顺序，也是和平原的成陆过程相一致的，它们基本是随着岸线的北移，从南到北，依次出现的（见下图）。

（三）从这些市县城市的起源，又可以看到，按起源的地域类型，它们可以分成二类：起源于海岸地带和起源于南部山区。其

中前者是少数,其特点是起源过程中,城市的位置固定少变;后者是大多数,其特点是起源过程中,城市的位置发生迁徙。陈桥驿先生在研究绍兴城市起源时得出的“山区——山麓冲积扇地带——平原孤丘地带”的迁徙规律,对宁绍平原绝大多数城市都是适用的。



宁绍平原城市出现年代顺序示意图

(四) 从城址的地形类别看,所有这些市县城市都起源于孤丘聚落。这说明陈桥驿先生关于绍兴城址地形特征的研究,对宁绍平原的城市是普遍适用的。根据陈先生的理论,城市起源于孤丘地带,乃是平原初成陆时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这一点,是今后的城市规划工作必须注意的。

(五) 现代城市地理学的区位理论,对历史时期宁绍平原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也是普遍适用的。根据城市区位的变化,可以解释历史时期本地区城市的兴起和衰亡,也可以预测未来本地区城市的发展前途。